

行
筆
集

李昌憲先生七十華辰紀念文集

陳興玉題



田志光 李峰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昌憲
文集

李昌憲先生七十華辰紀念文集

陳興玉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咏归集：李昌宪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田志光，李峰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 - 7 - 5203 - 2071 - 9

I. ①咏… II. ①田… ②李… III. ①李昌宪—纪念文集
IV. ①K825. 4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41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5
插 页 2
字 数 520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田志光 李 峰

编 委 宋 炯 张鹏斗 郭文佳 胡彩云 李 明 吴晓萍
刘永明 张 明 薛政超 于海平 李月红 郭 琳
史云贵 朱奎泽 韦琦辉 赵炳林 尤东进 李宗俊
赵贤植 邹锦良 付先召

序言：恭祝昌宪先生七十华诞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汪圣铎

李昌宪长我一岁，我俩是多年的挚友。回想我们的相识，却搞不清始于哪一年。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先认识李昌宪的文，其后才见到其人的，初见面就没有陌生感，所以反而忘记是哪年哪月了。我于1987年从北京经济学院调入中华书局，做大型学术刊物《文史》的编辑。出于职业习惯，我对学术界的人和事都较为敏感，不但关心已经名声鼎赫的，也关心“潜力股”；不但关心他们的过去，而且关心他们的未来、关心他们之间的恩怨，甚至关心一些人的逸事包括花边新闻。有人说，当编辑的人都是势利眼，我觉得这话有几分道理，因为作为编辑，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人都知根知底，有时候不能不依赖社会评价体系。更有时为了给自己减轻压力，适当多发些名人的稿子，也属事出无奈：因为名人一般比较爱惜名誉，出大问题的几率较低。我一到岗就看到了李昌宪的稿子——《宋代帖职制度研究》。我的长项是财经，帖职于我而言很陌生，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读懂全文，越读越感到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且深深地为作者的学术造诣所折服。一打听，本文作者竟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不禁想到这是位“潜力股”，出于职业习惯，牢牢地记住了“李昌宪”的大名。此后，我在研究宋史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个疑难，即宋代“军”的问题，既有节镇的“军”，又有州郡的“军”，还有县级的“军”。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我又看到了李昌宪的大作《宋代的军、知军和军使》，当时遗憾得不行，觉得此文本该在《文史》刊出，却被别的刊物刊用了。《文史》自建立就以“摒弃浮华”为宗旨，李昌宪的文章，从风格到内容，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这使我更加注意李昌宪。后来，李昌宪的大作《宋代四川帅司路考述》《宋代安抚使制度研究》（上、中、下）的刊出，也与此有关。在此过程中，我与李昌宪见面了，然而究竟是什么确切时间，却忘记了。

我与昌宪兄之间能有较深的情谊，除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外，更主要的是有许多共同点：年龄相近，经历相仿（同是1968年去插队），同以宋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治学风格也有相似之处。回头计算，我与昌宪真正在一起的时光其实很有限。其中较长的一次是去台湾参加宋史学术研讨会。那是1999年，当时不能直飞台湾，必须先到香港办入台手续。我与同被邀请的几位学者商议，一块落脚到香港中华书局招待所，因为香港中华书局与北京中华书局是兄弟单位，较为可靠。我们到了香港才知道，招待所的条件相当简陋，因为事情是我张罗的，所以颇为内疚。昌宪兄及另几位学者却都没有怨言，给我很大安慰。昌宪与我同住一间，我们促膝相谈，把不能写在纸上的話讲了个够。香港的宋史学者几乎全数参加接待，为我们安排许多活动，我与昌宪在这里朝夕与共度过了愉快的两天。然后，我们一同飞赴台湾。在台湾，我与昌宪仍然被安排住同一房间，会上会下，我们总在一起。昌宪有不少亲戚在台湾，昌宪的亲戚招待昌宪会餐，昌宪拉我一起参加，使我第一次与台湾普通民众直接接触，感到大开眼界。会后与会者分开行动，我与昌宪又一同返回香港。几天下来，我们交换了对宋史研究现状的看法，也谈及了各自的家庭情况，我们真正成了彼此了解、相互信任的朋友。这之后，又是在宁夏召开的宋史年会，我见到了昌宪夫人，感受到昌宪家庭生活的美满。我们一同考察了西夏王陵，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此后，学术会议上相见的机会增加，彼此的了解也不断加深。我们又相继被增选为宋史研究会的理事，使我们的共同经历又增加了一项。

我与昌宪之间也有不同点，最突出的是性格上的差异。我毕业于中文系，从小又喜爱文学，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比较崇尚自由，行为上时时有不受拘束的倾向。我常常喜欢标新立异，很早就公开同权威、大家对立，惹来许多麻烦。昌宪兄却是个行为严谨的人，有学史人的谨慎。宋史研究学者中，颇有些“酒鬼”，时时有失态之举，昌宪兄却从不与这些人为伍。宋史学者中，颇有才华横溢、好发高论者，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语惊四座。昌宪兄很早就有颇有影响的文章问世，但却从不张扬，总是低调地生活，也从不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惊人之论。我曾用一个字来概括昌宪，那就是“实”，作风朴实、治学踏实、为人诚实、学术扎实。纵观他的成果：《五代削藩制置初探》《宋代安抚使考》《司马光评传》《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

《金代行政区划史》《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都贯穿着这个“实”字。他用扎实实地研究，将人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向深度、广度大大地拓展。这些成就，将长久地存留，持续地发挥作用。昌宪除了他的学术成果之外，他奉献给当今社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脚踏实地的精神。

当然，昌宪还有一个贡献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他作为一个老师言传身教，教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我坚信，他的学生不但能将其师的研究成果发扬光大，更能将其师的踏实治学的精神继承弘扬。

最后，为恭祝昌宪先生七十华诞，特赋歪诗一首，以助欢喧：

勤勤恳恳数十年， 扎扎实实著巨编。
千头万绪厘清楚， 混沌世界展真颜。
桃李成蹊玄湖畔， 匠人精神有人传。
喜看今日史坛上， 万花斗艳群星闪。

2017年2月写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序言：恭祝昌宪先生七十华诞 汪圣铎 (1)

上编 名家力作

五代辽宋金元的“指斥乘舆”罪 王曾瑜 (3)

暗合前修诚可信

——读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 王瑞来 (19)

根基坚实的大厦

——再读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 王瑞来 (23)

宋代的罂粟 程民生 (26)

宋代的田宅交易投税凭由和官印田宅契书 戴建国 (39)

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形象的变化及其意蕴 范立舟 (57)

萝岗钟氏族谱所收崔与之撰墓志铭并邮札考辨 曹家齐 (93)

宋代近海航路考述 黄纯艳 (107)

辽代熟女真问题刍议 关树东 (127)

家族嬗变与民族融合

——从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个案家族考察 王善军 (138)

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 张金龙 (163)

南宋三衙马政问题试探 范学辉 (175)

中编 李昌宪先生代表作

五代削藩制置初探 李昌宪 (207)

宋代文官帖职制度 李昌宪 (220)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李昌宪 (257)

下编 学生论文

唐宋合班制度的演变途径 宋 炯 (275)

论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 郭文佳 (294)

敦煌本道经《十戒经》考论 刘永明 (308)

宋代国信所考论 吴晓萍 (331)

秩序与创新：粤北瑶族文化的现代困境与解决路径	赵炳林	(340)
宋代枢密院司法事权考述	张 明	(356)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影响	朱奎泽	(368)
敦博 58 号文书与两唐书《地理志》等相关问题考	李宗俊	(388)
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攻城战	韦琦辉	(413)
南宋士人“好书”风尚探析 ——以周必大为例	邹锦良	(423)
宋代枢密直学士考论	田志光	(435)
唐代后期颍州隶属诸方镇沿革及相关情况考辨	付先召	(466)
北宋文武换官制度探析	尤东进	(480)
后 记		(508)

现代汉语词典的“近义词”用

中同近义词的辨析与运用

上 编

名家力作

“近义词”这个词，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新收入的一个词条。在“近义词”这个词条下，列出了“近义词”、“同义词”、“反义词”三个子词条。在“近义词”词条下，对“近义词”的概念、特征、分类、辨析、运用等做了简要的说明。对“近义词”的概念，是这样说明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近或相似的词。”对“近义词”的特征，是这样说明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它们的外延和内涵都有所重合，但又互不相同，不能完全等同，所以叫‘近义’，而不是‘同义’。”对“近义词”的分类，是这样说明的：“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近义词的外延是否一致，可以分为同义词类和反义词类。”对“近义词”的辨析，是这样说明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近义词，它们的外延和内涵都有所重合，但又互不相同，不能完全等同，所以叫‘近义’，而不是‘同义’。近义词的辨析，就是通过分析它们的外延和内涵的差别，从而确定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使它们各得其所，各尽其用。”对“近义词”的运用，是这样说明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近义词，它们的外延和内涵都有所重合，但又互不相同，不能完全等同，所以叫‘近义’，而不是‘同义’。近义词的运用，就是通过分析它们的外延和内涵的差别，从而确定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使它们各得其所，各尽其用。”

五代辽宋金元的“指斥乘舆”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曾瑜

“指斥乘舆”罪，且不说一般人，就是从事中华古史专业者，只怕也有相当比例的生疏。但如果换一句现代语，“骂皇帝”，大家就都会懂得。明朝高拱解释说：“乘舆，谓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舆也。”^①谁要骂皇帝，就算犯了弥天大罪，但也只能称为“指斥乘舆”，即指斥了皇帝的座车，避讳用“皇帝”一词，以示“皇帝”一词的神圣性。宋朝张浚也解释说：“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是以见君辂马，必加礼而致恭，盖不如是，无以肃名分，杜僭乱也。”^②

从古代史籍中搜索，尽管早在秦汉时代已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帝制，但直到 840 年后的唐朝，今人才在《唐律疏议》中，第一次看到对“指斥乘舆”罪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当然，唐律源于隋《开皇律》，但《开皇律》已佚亡。《唐律疏议》卷一《十恶》，确定如今人们常说的“十恶不赦”罪。“六曰大不敬”，其中就包括“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但疏议又对此作了法律规范和说明，“若使无心怨天”，“不入十恶之条”，“盖欲原其本情，广恩慎罚”。同书卷一〇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指斥谓言议乘舆，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谓语虽指斥乘舆，而情理非切害者，处徒二年”。同书卷二三又规定：“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官司承告，不即掩捕，经半日者，各与不告罪同。”宋理学家程颢对“情理切害”有所解释，说：“旧言指斥乘舆，言理恶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③从上引法律条文看，对“指斥乘舆”罪的处置是极其严厉的。

① 高拱：《本语》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50 册，第 849—861 页。

②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四部丛刊》本。

③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一〇，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06 页。

若追溯“大不敬”的刑名由来。《史记》卷九六《申屠嘉列传》载，他劾奏汉文帝幸臣邓通：“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同卷《魏相列传》记载，因“大不敬”罪，“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汉书》卷八九《黄霸传》说：“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载，“下（蔡）邕、（蔡）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经吕强营救，“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汉律源自秦律，故大致可以判断，在秦汉时，已有“大不敬”“当死”，“弃市”的刑名，但还没有唐律那样细致的规定。

自晋朝以下，历代都有“大不敬，弃市”的刑名，^①在此不必赘述。《隋书》卷二五《刑法志》记载，北齐河清三年（564），定“齐律”，“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北周保定三年（563），定“大律”，“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凡恶逆，肆之三日”。隋律则“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这就是前述唐律“十恶”之所本。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法律无非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②“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③法律必须维护阶级社会的阶级统治秩序，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由于国家的公权力是从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转化而来，部分法

^① 《晋书》卷五〇《庾亮传》，第1403页；卷六一《周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60页；《梁书》一六《王亮传》，第268页；卷五三《伏暅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6页；《魏书》卷七七《辛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1页；《北齐书》卷四七《宋游道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54页；《北史》卷四二《刘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页。

律也有管理公共事务规则的功能。这与前者是互相融合和渗透的，一般并不互相排斥。

就“指斥乘舆”罪的制定而论，它无非是服务于进一步强化皇权，并将此种功能推进到了极致，其阶级性和专制性极为鲜明。故“指斥乘舆”的罪名也必然被后代所继承。宋人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名讳，在《宋刑统》卷一中，将“大不敬”罪改成“大不恭”罪。《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照抄《唐律疏议》，其“十恶”之六“大不敬”中，就有“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同书卷一〇四《刑法志·大恶》规定：“诸指斥乘舆者，非特恩，必坐之。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职官辄指斥诏旨乱言者，虽会赦，仍除名不叙。”在中国古代史料中，有时也略去“乘舆”两字，简称为“指斥”罪；“指斥”罪的范围较宽，不一定全是“指斥乘舆”。

五代是武夫横行的时代，皇帝的权威下降。军阀安重荣上表晋高祖石敬瑭，“其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但晋高祖无法给他治罪，“忧其变也，遂幸邺都，以诏谕之，凡有十焉”^①。后周时，得南唐“蜡丸书来上。多斥周过恶以为言”，周世宗大怒，责备南唐使者孙晟，说：“晟来使我，言（李）景畏吾神武，愿得北面称臣，保无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将孙晟“及其从者二百馀人，皆杀之”^②。后周时，赵守微“本村民，因献策，擢拾遗，有妻复娶，又言涉指斥，坐决杖配流”，但没有处死，而御史中丞边归谠对周世宗说：“陛下何不决杀赵守微！”^③但处事颇能决断的周世宗仍未采纳，大约赵守微虽是“言涉指斥”，而没有确实的“情理切害”证据。

辽朝法律的制定，当然参照唐律。辽太宗天显七年（932），“林牙迪离毕指斥乘舆，囚之”^④。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辽圣宗“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⑤。太平八年（1028），“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孙妇

^① 《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03页。

^② 《新五代史》卷三三《孙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6页。

^③ 《宋史》卷二六二《边归谠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070页。

^④ 《辽史》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页。

^⑤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第145页；卷六一《刑法志》，第939页。

阿跋指斥乘舆，其孙骨欲为之隐，事觉，乃并坐之，仍籍其家”。^① 可知辽朝确是沿用唐律之“十恶”和“指斥乘舆”罪。辽朝末年，在金朝的攻击下，燕王耶律淳自立为帝，他死后，辽天祚帝下诏，历数耶律淳罪状，其中有“僭称帝号，私授天官，指斥乘舆，伪造符宝，轻发文字，肆赦改元”等罪。^②

宋太祖时，丁德裕在西川，“奏转运使、礼部郎中李铉尝醉酒，言涉指斥。上怒，驿召铉下御史，案之。铉言德裕在蜀日，屡以事请求，多拒之，皆有状。御史以闻，太祖悟，止坐铉酒失，责授左赞善大夫”。^③ 开宝二年（969），丁德裕奏张延通“尝对众言涉指斥，且多不法事”，又指张屿为同党。“太祖怒，即收延通、张屿及王班下御史台，鞫之，延通等引伏。太祖始欲舍之，及引问，延通抗对不逊，遂斩之。屿、班并内臣王仁吉并杖脊，屿配流沙门岛，班许州，仁吉西窑务”。^④

宋太宗发动政变，篡位成功，于太平兴国七年（982），举办亲弟秦王赵廷美狱案。其中有阎密“恣横不法，言多指斥”，予以处斩。^⑤ 此案又牵连宰相卢多逊，宋太宗亲自下诏说他“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但并不处死，而是“配流崖州”。^⑥ 太平兴国八年（983），宋太宗“斩孟州进士张两。两试吏部，不合格，纵酒大骂于街衢中，言涉指斥，游徼吏捕以闻。上怒，故抵于法，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州长吏罚一季俸”^⑦。此次狱案甚至株连同保的举人，罚他们“永不得赴举”，连孟州知州也“罚一季俸”，足见宋太宗的盛怒，完全是法外加罚。他又下制书，说其宠臣弭德超“诟骂同列，指斥朕躬，为臣若斯，于法何逭”，“配琼州，禁锢”^⑧，但没有处死。宋太

^① 《辽史》卷一七《圣宗纪》，第202页。

^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九，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宋史》卷二七四《丁德裕传》，第935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后简称《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十二月己亥，第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版。

^④ 《宋史》卷二七四《张延通传》，第9355页；《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十月癸卯，第91页。

^⑤ 《宋史》卷二四四《赵廷美传》，第8667页；《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丁丑，第196页。

^⑥ 《宋史》卷二六四《卢多逊传》，第9119页。

^⑦ 《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乙酉，第205页。

^⑧ 《宋会要》职官七八之二一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

宗宠信侯莫陈利用，后“京西转运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书数纸，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进上。太宗怒，令中使脔杀之，已而复遣使，贷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马旋泞而踣，出泞换马，比追及之，已为前使诛矣”^①。宋太宗实行特务政治，柴禹锡和赵鎔“尝遣吏卒变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与卖书人韩玉斗殴，不胜，因诬玉言涉指斥。禹锡等遽以闻，玉坐抵法。太宗寻知其冤”^②。在此件冤案中，韩玉显然被处死。至道时，郑元辅“诣检上书，告（赵）自化漏泄禁中语，及指斥非所宣言等事。太宗初甚骇，命（宦官）王继恩就御史府鞫之，皆无状，斩元辅于都市”^③。

宋仁宗时，刘敞“纠察在京刑狱，营卒桑达等醉斗，指斥乘舆。皇城使捕送开封，弃达市。敞移府，问何以不经审讯，府报曰：‘近例，凡圣旨及中书、枢密所鞫狱，皆不虑问。’敞奏请一准近格，枢密院不肯行，敞力争之，诏以其章下府，著为令”^④。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皇城使、开州团练使沈惟恭除名，琼州安置，进士孙棐处死。惟恭，贵妃沈氏之弟，故宰相伦之孙。棐，开封人，惟恭门下客也。惟恭以干请恩泽不得志，觖望，尝为棐言：‘皇子生，必不久。’语涉咒诅，又假他人指斥乘舆之言以语棐。棐希惟恭意，每见，辄诋时事，亦尝指斥乘舆。后又诈为司马光陈五事章疏，以示惟恭，词极不逊。惟恭转以示人。四方馆归司官张泽得之，以示阁门使李评，评奏之，故败。棐既伏诛，馀传写人皆释罪”^⑤。此处所谓“进士”，其实只是文士。熙宁八年（1075），“沂州民朱唐告前馀姚主簿李逢谋反，提点刑狱王庭筠言其无迹，但谤讟，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请编配”。宋神宗特别派遣官员按治，“庭筠惧，自缢死。逢辞连宗室、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诏捕系（御史）台狱”。“狱具，赐世居死，李逢、刘育及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

^① 《宋史》卷四七〇《侯莫陈利用传》，第13679页；《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三月乙亥，第250页。

^② 《宋史》卷二六八《赵鎔传》，第9225页。

^③ 《宋史》卷四六一《赵自化传》，第13508页。

^④ 《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第10384页；《长编》卷一九〇嘉祐四年七月庚申，第1749页；刘攽：《彭城集》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6册，第347页。

^⑤ 《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第1965页；《宋会要》职官六五之三二。